当年,我们是班上一对“活宝”

倾诉人:施顺才,男,71 岁,白下区

上月,为了庆祝初中毕业 55 周年,我们南京五中初一乙班的同学又聚到了一块,席间大家提到了吴昌洲,那个当年班上的超级活跃分子,不禁让我又重忆起和他泡在一块的三年时光。可就在 20 多年前,鼻咽癌夺走了他的生命,如今聚会少了他,总觉得有些冷清。

与同学合影于 1954 年,二排右五为吴昌洲,一排右一为施顺才

上学时 他总爱戴顶礼帽

那是 1951 年初一刚开学时,同学彼此之间还很生疏,但大家都对吴昌洲这个人印象颇深,那是因为他经常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,高高的,怎么看都和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不协调,还略显有点滑稽。后来才知道,他家在升州路上就是开礼帽店的。

我和吴昌洲逐渐熟络起来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爱好——篮球,每次下课铃一打响,打头冲出教室的准是我们俩,呼朋引伴就在操场上打起比赛来。他个高是后卫,我虽个不高,投篮的命中率却不亚于他,所以理所当然当了右前锋。

碰到下雨天是我和吴昌洲最头疼的日子,因为学校的操场是露天的,打球不得不被中止。这时吴昌洲就出了个点子,当时的金陵中学有个室内球场,于是休息日我们就悄悄溜达到金陵中学,趁人不注意翻墙进入,走时再翻墙而出,人不知鬼不觉。我们的友谊和默契是在打球中培养出来的,后来我们才发现,原来他上学必经我家在莫愁路上的豆腐店,于是上下学我们都一道,初中三年从未改变。

我们一起把地理老师气哭

初一乙班的调皮捣蛋当时全年级闻名,而且班上的同学异常“团结”,这里所指的“团结”是当老师询问班上谁带头捣乱时,全体同学守口如瓶,有股“打死也不招”的“气概”。后来想是我和吴昌洲常常充当了领头人的角色,直到数年后的同学聚会,大家还说我们是当时班上的“两活宝”。

吴昌洲的搞怪本领我一直自叹不如,他最擅长的是模仿。当时有名老师口音很重,说话时还喜欢带上一句口头禅——这个,吴昌洲就常抓住他这么一点大肆做文章。下课后他会大摇大摆地走到讲台上,模仿起这名老师说话的样子,还真像,我肯定是和他一唱一和,在下面装学生提问,瞬间就能逗得全班哄堂大笑。

最严重的一次,我们居然把一名地理老师气哭了。记得,那是名年轻女老师,刚从学校毕业,学生气未脱,长相清秀,说话还有些害羞。那天她讲的是关于气象方面的知识,为了确定我们听懂没,她还好意地问我们:“听懂没?”也许是见新老师好欺负,我和吴昌洲使了个眼色,便带头叫起来,“不懂,不懂!”全班很配合,一起大呼“不懂”。女老师有些尴尬,只得再讲解一遍,随后又问:“懂了吗?”“不懂不懂啊,老师!”其实她讲解得倒是透彻。女老师明显听出了恶作剧的味道,眼眶红了,气着跑出教室。现在想来,我和吴昌洲在老师眼里一定是调皮捣蛋的“坏孩子”。

毕业后我们联系少了

那三年,我多数时光都是和吴昌洲泡在一块,我发现他这人除了调皮,其实还挺仗义的。一次我们放学回家,迎面来的一辆自行车撞上了我,我的胳膊被狠狠划了一下。谁想对方非但没道歉,却不依不饶起来,嘴里骂骂咧咧地说没长眼。见我受气,吴昌洲冲上去和他理论,见对方人高马大的,我心里倒有些害怕,只好一旁劝架。事情虽然不了了之,但心里倒挺佩服吴昌洲的仗义。

毕业前的那个初夏,由辅导员带队,全班徒步去中山陵露营,一共住了三天。白天我们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戏,晚上我们就开“西瓜晚会”,同学们唱歌跳舞,我和吴昌洲还表演了双簧。

晚上我们五六个同学一个帐篷,山上有蜈蚣还有很多的蚊子,几乎睡不安稳,大家就彻夜聊天。直到如今我依然记得那个情景,有时做梦还能梦到那个布满星星的天空,那些互相拍打蚊子的同学们,当然还有吴昌洲。

之后的日子,同学们聚少离多,吴昌洲上了高中,我去了专科学校,联系渐渐少了。直到1965 年,我从北京回南京工作后,托人又打听到了他的情况。再见面时是在他新街口的家里,我们没有丝毫的生疏,他好菜好饭地热情招待了我。聊起当年一起做的那些调皮的事,大家像是回到了从前一般,临分别前我们还互相嘱咐要常走动。

他的去世来得那么突然

可能有了家庭后我就开始忙工作,忙子女,分身无暇。有多久没联系吴昌洲我记不清楚了,好像有两年的样子,直到我们单位有个项目要做,我才突然想起可以向吴昌洲打听一下,因为他所在的单位就经营这个。记得那天我向他的办公室拨了电话,接电话的是他的同事。“吴昌洲?”他回答时语气有些诧异,随后说:“人走了。”“人走了?是什么意思?”我没听出话里的其他意思,以为人走了是不是不在这个单位了。“他前不久去世了,你难道不知道?”我有些蒙了,半天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“哦,我们有段时间没联系了。”匆匆搁下电话后,我脸上一阵冰凉。后来我去过他家一次,才知道他因鼻咽癌不治去世的,走时 50 岁还不到。

2004 年,初中毕业 50 周年,很多同学聚在了一块,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吴昌洲,连带着就提到了我们当年的“糗事”。说话间,有些同学流泪了,为他而惋惜。这几年,我们每年都聚,每次都必谈到他。

你现在在天堂还好吗?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爱说笑呢?你知道吗,同学们都还记得你。

快报记者 赵丹丹 整理

我的五个妹妹一个弟弟

后排左起:庆娣、庆凤、庆宁、庆平
前排左起:庆庆、庆祥、庆全
摄于1964年

父母去世了,我们姐弟活着,活得很好,和谐、快乐、幸福。我已 67 岁了,老七是弟弟,才四十多岁。二妹在外地,我们六人都在南京,都在秦淮河畔做老城南人。我爱我的妹妹弟弟,爱他们的过去,更爱他们的现在。

为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,我十四岁就响应国家支援苏北建设的号召,在徐州农村当小学教员,那是 1956 年。几年后调当地电台电视台当播音员、记者、编辑,一直到 2002 年退休。2004 年我叶落归根,从外地回到了故乡南京。

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弟弟妹妹们都有一些生动的生活画面定格在我的心中,闪烁在我的眼前。

二妹庆宁,我很佩服的人。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,她就辞去三线某工厂总工办主任的职务,只身去深圳闯荡,后来她成功了,丈夫和女儿也迁到了深圳,特区新城又多了一户南京人家。

三妹庆娣,前年退休,还在老有所为,是南京市古筝协会副会长。有一天,我在郑和公园,忽然看见是她在领着秦淮区退休教师跳万步走健身舞。哟,好漂亮的三妹,高挑匀称的身材,踏着轻盈的舞步,还是那么青春美丽,神采飞扬。

四妹庆平,也从教育岗位退休,文革前,她作为南京第一代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演员,在夫子庙解放电影院的大舞台上独舞,那美丽动人的画面让我记忆犹新。

五妹庆全,知青返城后在大同被单厂做挡车工,有一次我在工厂找她,在大门口橱窗光荣榜里看到了五妹的大照片,美丽的巧手姑娘,闪闪的大眼睛在告诉我:“大姐,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。”我取消了去车间看她的计划,悄悄地离去了。

小妹庆庆,小弟庆祥,跟着父母下放沭阳农村,在乡下苦了十年,邓小平的好政策,又让他们跟着父母回到南京门西老家。回城后,小妹庆庆在南京某造纸厂当会计,下岗后,凭着自己的能力,被南京一家大型房产公司聘为财务总监。

小弟庆祥是沈家的独苗苗,上天恩赐他也生了个儿子,让沈家家谱可以延续下去。小弟回城后在南京针织内衣厂,是某车间的党支部书记。针织内衣厂解体后,他在一家外企找到了岗位,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

我爱我的妹妹弟弟,虽然他们都是普通人,但他们的善良、宽容、诚实,让我感到骄傲和欣慰。

沈庆凤